

自 序

在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中，史料学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且又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不具备中国现代史史料学的知识，就无法深入有效地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也不可能取得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道理不言而喻。如果研究者对中国现代史的史料没有一个全面和深刻的了解，他们在搜集史料时可能会不自觉地遗漏一些史料，不能做到对相关史料“一网打尽”，或者在搜集史料时发生以偏概全的现象。同时对搜集来的史料不做一些必要的考订工作，不注意史料引用的规范，致使其成果在引用史料方面存在很大的漏洞。这些现象都会严重影响他们的研究，致使其研究成果的可信度大大降低。

有鉴于此，四川大学把中国现代史史料学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的一门必修课，给予高度的重视。其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此项课程的学习，使该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能够掌握一些中国现代史史料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为他们进行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使他们在搜集和整理史料方面尽快进入角色，少走弯路。从这点来说，本书主要是为中国现代史方向的初步研究者提供教材，也可以当做他们搜集与整理史料的一个工具书。

中国现代史史料学是一个历史较短的学科，目前关于该学科的理论框架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本书在编写的过程中，借鉴了一些以往出版的有关史料学的专著，例如北京大学张注洪的《中国现代革命史史料学》，南京大学张宪文的《中国现代史史料学》，中国人民大学何东的《中国现代史史料学》，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的部分内容，书中不再一一注出，这里表示

诚挚的感谢。

本书与以往史料学各书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就是它尽可能地搜集了近年来出版的一些中国现代史史料，可以说涵盖了中国现代史史料的一些最新成果，并且概要性地介绍了这些史料的主要内容，涉及档案、历史文献、期刊、回忆录、传记、日记等。初涉中国现代史研究者通过阅读此书，可以对中国现代史的史料状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由此能够节省一些时间。

另外，本书作者还根据自己的研究经验，对中国现代史史料的整理和运用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方法作为借鉴，以帮助初涉学界者。

最后，本书因编纂时间仓促，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舛误，分类也可能存在不周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2008年5月25日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历史档案·····	(7)
第一节 档案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	(7)
第二节 中国现代史历史档案的整理与保存·····	(10)
第三节 历史档案的出版现状·····	(21)
第二章 中国现代史历史文献·····	(49)
第一节 关于旧政权的历史文献·····	(49)
第二节 关于中共的历史文献·····	(53)
第三节 关于抗日战争的历史文献·····	(60)
第四节 其他有关专题的历史文献·····	(76)
第三章 中国现代史报刊·····	(90)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报刊·····	(91)
第二节 其他报刊·····	(109)
第四章 历史回忆录·····	(140)
第一节 回忆录的特点和利用·····	(140)
第二节 回忆录的编写和出版·····	(147)

第五章 传记、日记、文集和旧书	(156)
第一节 人物传记和口述史.....	(156)
第二节 文集、日记、年谱.....	(167)
第三节 旧书籍.....	(175)
第六章 中国现代史工具书	(179)
第一节 目录、索引、文摘.....	(179)
第二节 年表、大事记、大事简介.....	(182)
第三节 辞典、年鉴、名词解释.....	(186)
第四节 外文工具书.....	(188)
第七章 中国现代史史料的整理和运用	(191)
第一节 史料的整理.....	(191)
第二节 史料的运用.....	(196)

绪 论

一般认为，史料学是研究搜集、鉴别、整理和利用史料的学问，是历史科学领域中的一门重要学问。史料学在历史科学领域占有异常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真正研究的开始。本书实际上讨论的是中国现代史的史料学。一般来说，历史专业工作者无论研究哪一时段的历史，首先必须对该阶段的史料学具有非常细致的了解，这样他才能对该时段史料的情况非常清楚，搜集和利用史料才能游刃有余；否则，单靠自己摸索史料，难免以偏概全，丢三落四。纵观学界，一般在学术上成就卓著者，无不对史料及史料学了解得较为透彻，否则很难取得很大的成就。因此，对于初涉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学子来说，研究伊始，一定要对中国现代史史料学进行学习。而欲了解史料学，首先必须对史料有所认识。

一、关于史料

众所周知，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材料，没有史料，历史研究就是缘木求鱼，空中楼阁。历史研究绝大部分的工作就是搜集各种各样的史料，包括第一手的和第二手的，正面的和反面的史料，进行鉴别和整理，从中探寻历史的真相，或许能够发现历史发展的一些规律，然后撰成专文和史著，以资鉴世。

所以，史料对于史学研究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著名史学家傅斯年先生论及历史研究时曾说：“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

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① 历史学家的结论必须以充分的史料作为依据。史学家只有尽可能地掌握更多的史料，对事实的叙述才能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史料不够充足，史论就显得苍白无力，漏洞百出，不能取信于人。

中国历史上史料众多，层出不穷。若按照史料的性质来划分，大体可分为实物史料、文字史料、口碑史料三大类。严格地分，实际上是两大类，即实物史料和文字史料。因为口碑史料是根据亲身经历事件者或听说者口述事件经过，记载下来而形成的史料，实际上仍属于文字史料。

实物史料的种类较多，大致可分为四种：第一种是金石。“金”指铜器，商周的青铜器当时被称为金，主要有礼器、乐器和兵器等。其他青铜器有度量衡、货币、车马饰、镜鉴等。“石”指石刻，主要有刻石和碑碣等，如墓志、塔铭、浮图、经幢、造像、摩崖等等。金石学到宋代才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宋代以后金石学研究范围逐渐扩大，诸如瓦当、印玺、封泥、明器、简牍、甲骨等都属于金石学的范围。第二种是甲骨。广义的金石学包括甲骨，但甲骨学单独是一门学问。所谓甲骨，也就是甲骨文，又称殷代贞卜文字或简称卜辞，因其在殷墟出土，所以又称殷墟书契。第三种是竹木。在纸张发明以前，古代的文书大多记载在竹木上，称为竹简或木简。这些对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具有巨大的价值。第四种是帛书。以上这些实物史料上面多是有文字的，并且它们的史料价值，主要就体现在上面的文字。按照有些学者的分类，器物上的铭题、帛书和大部分简牍都应属于文字史料。由于这些文字的载体是各种古器物，所以又把它们归于文物类，列为实物史料。

至于中国历史上的文字史料，则更是种类繁多，数不胜数。史学名家章学诚（实斋）先生曰“六经皆史”。其实何止六经，史部以外的文献都可以作为史料。故举凡历史上的诗集、文集、词选、曲录、

^① 傅斯年：《史料论略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7页。

传奇、笔记、小说、方志、家谱、玉碟，以至政府档案、奏章、公文、广告、布告、私人信札、道书、佛典、契约账簿、邸报等一切文字的记载，无一不可以作为史料。

就连《史记》、《资治通鉴》等书，现在研究历史的人一般都把它们看做是史料。由于长期的历史积累，使中国古代的史料浩如烟海，学者们即使皓首穷经，恐也难以览尽。据梁启超先生统计，仅见之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著述，就有 2174 部，共计 37049 卷。而未收入四库者仍有不少，足见中国撰述规模之浩大。

正由于此，中国古代史的史料学在前人长期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和成熟，逐步建立一套为大家所公认的史料学体系。尤其是明清以后，史学家们编辑了许多历史文献，搜集了大量文字史料、口碑史料和实物史料，研究了许多古籍的真伪和版本源流，订正了不少记载上的误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二、中国现代史的史料及其特点

与已经具有较好基础且比较成熟的中国古代史的史料学相比，中国现代史史料学却是一门新的学科。截至目前，对中国现代史史料学的体系和应包含的内容都还是众说纷纭，专家学者莫衷一是。

同中国古代史的史料相比，中国现代史的史料则别具特点：

第一，数量巨大。近代以降，由于现代机械印刷技术的普及，书刊的出版变得越来越容易，所以书刊数量也迅速增长；加之时间距今较近，因此资料的散失相对较少，保留下来的就比较多一些。步入近代以后，许多机构都已经建立了完备的档案存放制度，比较注意档案的保管，致使中国现代史的档案数量也成倍增长。另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现代史有众多历史人物，他们亲历了许多历史事件，留下了数量庞大的口述历史或者历史回忆录，这导致中国现代史的史料远远超出以往任何时期。

第二，杂乱无章。由于史料的总量太大，加上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无不

弃旧扬新，致使各种史料层出不穷，显得非常凌乱。

第三，政策性强。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涉及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的研究，因此一些相关方面的史料就具有较强的政策性。譬如有些史料涉及中共的文件、会议决议、中共发给地方党委的通知等，就具有较强的政策性。同时，政府出于保密以及安全等方面的考虑，对一些在中国现代史研究中颇为重要的档案和文件不予公开，致使学者查阅这些史料颇费周折。

第四，整理滞后。对于中国现代史史料的整理工作，基本上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的，其间由于各种原因，整理工作时断时续，进展甚微。迄今为止，中国现代史的史料，不仅缺乏总目，即使关于某一个方面的目录或专题目录也较缺乏。很多学者都是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独自探索。

依据中国现代史史料的特点，可以把中国现代史的史料归纳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文字史料。它包括中国现代史各个时期政府机关、政党团体、工厂企业和重要人物的档案、文件、账册、电函、信札、日记、笔记、文集、族谱、家谱，还有各种报纸、期刊、布告、传单、地方志，以及某些图书、诗文、歌谣、碑刻、碑文等。文字史料如果细分的话，又可分为档案资料、历史文献资料、报刊资料、记忆史料（含回忆录和口述史）等几种。

第二类是非文字史料。它又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电化史料。即运用现代电子和化学手段记载下来的史料，包括各种历史照片、影片、唱片、幻灯片、微缩胶卷、录像、录音带、光盘等。这种史料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出现的，并且由于其能够保存长久而不易损坏的优点，目前已呈越来越多之势。

另一种是实物史料。实物史料根据其来源，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关中共的文物，如石刻、标语、壁画、布告、匾牌、印章，以及衣服用品、武器、钱币、邮票、旧址等。这些文物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历次收集，大部分已经入藏，少数不能移动的文物和旧址留在原地

保护。对这些文物，人们可以通过参观展览馆得见其珍品和复制品，如“一大”旧址、八七会议旧址、遵义会议纪念馆、延安革命纪念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等地，以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活动和居住的旧址，通过实地调查，增长历史知识，收集文物或史料。当然也可以通过书籍和图片得知其史料。另一类是关于旧政权的文物和一般文物，如匾牌、印章、武器、刑具、产契、钱钞、衣服用品等。还有一些博物馆和遗址等，例如南京总统府、九一八事变博物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四川建川抗战博物馆保存有大量抗战时期的文物，目前这类博物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三、史科学和历史科学

前面提及，史科学是研究史料的一门学科，它和历史科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也有重要的区别。

历史科学的任务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详细地利用材料，通过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研究，得出科学的结论，以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而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

史科学的任务是对史料进行搜集、整理、分类、校勘和考订。它要考订史料的真伪，确定史料的年代、作者、版本和来源，辨明史料的价值，从而为历史研究工作提供丰富的史料。比如，一个重要政治人物的历史回忆录，可以为历史研究工作提供重要的史实。但是，我们要确定这份回忆录的可靠性和使用价值，就首先必须对它进行考订，把它和其他人员的回忆录以及相关文献材料相印证，去伪存真，把错误的内容和正确的史实区别开来。这是史科学的基本任务。

史科学是为历史科学服务的。它们之间是不可分离的。但是，史科学并不等于历史科学，更不能代替历史科学。譬如，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辑录了1927年南昌起义后到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前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文献资料260篇，都是江西省档案局保存的档案史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编者对这些文献

进行了一些校勘工作，对明显错误的字句做了校注。原资料无标题的，加了标题。因缺损、脱落、字迹不清无法辨认的字句，则用方框号加以标明。这些认真细致的工作，都属于史料学的范畴。这部书为研究和搜集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提供了可贵的史料，但它不是中史革命根据地史的专著。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史料学属于历史研究法范围，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是史学基本训练的一种。历史研究的基本工作来源于历史史料，但研究的成果要高于史料。

中国现代史史料学，是高等学校历史系研究生的一门学位课程。开设这门课的目的，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分析中国现代史的基本史料，帮助学生了解史料的来源、价值，使学生初步掌握中国现代史的一般史料知识和查找、鉴别、使用史料的基本方法，为学习和研究中国现代史打下基础。

作为一门研究生的基础课程，中国现代史史料学不可能将中国现代史所有史料囊括殆尽，而只能让学生熟悉最基本、主要的史料。根据史料学本身的特点，在教学方法上，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也就是说，除课堂讲授研讨外，学生还必须参加实践活动。其主要通过三个步骤来实施。第一，认识史料，熟悉史料。第二，组织学生做练习，使学生掌握鉴别、校订史料的方法，学习如何利用中国现代史的有关工具书。第三，到档案馆和图书馆进行实习，扩大和加深中国现代史史料学的知识。鉴于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实际需要，本书介绍的中国现代史的史料基本上以文字史料为主。下面各章分门别类地对中国现代史的史料予以介绍。

第一章 历史档案

在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中，历史档案无疑发挥了异乎寻常、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可以这么说，中国现代史研究最重要的史料就是历史档案。近代以降，随着社会的近代化，许多单位和部门都建立了较为规范的档案保管制度，如果没有什么不可避免的天灾和大的人祸的话，大多都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这些历史档案就成为中国现代史学者从事科研活动的无尽宝藏。翻检近年来出版的专业期刊和著作，由于发现新的档案资料从而纠正旧说、新见迭出的现象可说是举不胜举。因此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必须对档案资料予以高度重视，要花费相当大的精力与时间去翻检档案。

由于时间距离较近，所以有关中国现代史的档案可以说“堆积如山”，一个学者如果仅凭一己之力要想把有关中国现代史的全部档案看完一遍，恐怕力所不及。所以本章就中国现代史档案的一些问题做一简单论述，以便为初次涉猎中国现代史研究者提供方便。

第一节 档案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

中国现代史的档案史料在历史研究中发挥着异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在便用这些档案史料之前，应该对历史档案的来龙去脉有所了解，这样才能对档案的史学价值做到心中有数。

一、历史档案的来历

要认识历史档案，首先要了解什么是档案。档案是机关、部队、学校、团体、工矿企业和某些重要人物，在各种社会活动中所形成的并经过一定的工作程序集中保管起来的文件资料。一个单位和个人在广泛的社会活动和工作中，累积了许多文字资料。这些文字资料，反映着这个单位或个人活动的全貌。当这些文字资料还没有经过立卷手续转交给档案部门之前，一般叫做文书或文件。这些文书或文件，对这个单位或个人的活动，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当这个单位的文书部门将一个时期或某项活动所积存的文件，经过整理和挑选编入卷宗，并移送给档案部门时，这时的文书和文件便转化为档案或档案文件。

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文件都能转化成档案。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由于有些文件对以后工作无太大查考价值，所以没有必要列入档案保存；另一方面，有些文件没有经过档案保存阶段而直接公布了，如政党、政府的宣言、声明、决议等，这种资料只能叫文件，不能称为档案。

由此可以看出，文件和档案就其内容来说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只是由于保管方式的不同，才有了文件和档案的区别。档案的产生和存在，与形成的阶级、集团、个人的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反映着这些阶级、集团和个人的利益和需求。

中国具有档案的历史已经有几千年了，但最初不叫档案，而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名称，如“典册”、“典籍”、“文案”、“案牍”、“文卷”等等。现在一般认为，甲骨文实际上就是我国最早的档案资料，后来，人们用竹木板记事。纸张发明以后，档案内容更加丰富，使用和保管也更加方便。今天，不仅有文字写成的书面文件，还有照片、影片、录音等，都可以形成档案。

在中国历史上，档案的名称最早出现在清朝初年。当时，把放置档案的架子称档架，把一格叫做一档。这就是今天档案的由来。我国

有丰富的历史档案。在现代历史档案中，又分为中共历史档案和旧政权历史档案两大类。这些历史档案都是珍贵的历史资料，是国家和人民的宝贵财富。

二、历史档案的史料价值

自古以来，历史学家都十分重视历史档案。中国许多的历史名著，都是采用大量的历史档案文件编写成的。例如，《尚书》就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第一部档案文件汇编，相传由孔子编选而成，它成为儒家十分重要的一部经典，是研究先秦史的最好资料。孔子修《春秋》，也使用了大量的档案文件。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历史名著《史记》，同样引用了大量的官方档案。当时司马迁当太史令，具有掌握和调阅档案文件的便利条件。以后各朝都编有《诏令》、《圣训》等，都属于统治阶级编辑的档案文件集。但总的来看，我国历朝最集中地录取档案材料的文献汇编，还是各朝编的《实录》，例如《明实录》和《清实录》，基本上是采用官方的档案编辑而成的。

以上事例说明，我国封建社会的档案文件，在我国古代历史科学的发展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丰富的档案资料，就不可能有二十五史这些名著的诞生，我国的历史科学也不可能取得那样辉煌的成就。

历史档案能为我们今天研究历史提供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因为档案文件往往是在当时形成的，具有比较大的可靠性，也就具有更大的说服力。所以在一般情况下，档案反映的客观历史过程是较为真实的。我们研究历史，如果不查阅历史档案，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就很难得出正确的判断和结论。在各类史料上，历史档案的价值，从整体上说，超过其他种类的史料，在各类史料中居第一位。譬如口碑史料，尤其历史回忆录，都应该尽可能和文字材料，特别是档案史料相印证，才能确定它的准确性和价值。

从中国现代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上看，也可以说明利用档案史料的重要性。譬如党史上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瞿秋白、李立三、王

明等人的三次“左倾”错误，都和共产国际、斯大林的错误指导思想有很大关系。因此，要弄清这些问题，必须查阅共产国际的档案。档案里面有一些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报告，以及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许多指示等文件，通过这些大件，才有可能对这些错误的来龙去脉了解清楚。

档案材料常常可以纠正一些习以为常的见解。譬如，最初人们对胡适的为人品德的看法，受鲁迅的影响较大。鲁迅曾这样比较陈独秀和胡适，大意是，陈独秀的为人，好像他的门上明贴着招牌，内有武器，须小心，而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而胡适的招牌上写着，尽可以放心，而实际上，颇需小心，里面可能有些什么。言下之意胡适不是一个以诚待人的人。但耿云志先生根据他对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珍藏的胡适私人档案的研究，以及参阅他人关于胡适的研究成果，认为胡适是一个胸怀坦荡、真诚待人的人。可见档案史料在历史研究中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地位和价值。我们研究中国现代史，应当特别注意搜集、查阅档案史料。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档案所记述的内容，在多数情况下是可靠的，但也有不真实的或不完全真实的情况。特别是反动文件制作者，出于各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有时会伪造文件，或在档案里面有意歪曲事实，隐瞒真相。这种情况在旧政权档案中并不少见，因此我们必须正确地对待，认真地加以区分。

第二节 中国现代史历史档案的整理与保存

中国现代史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保存档案最多的一个时期。民国以来，档案界和学界对以前所存的档案进行了大量的整理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为中国现代史研究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史料。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现代史也是我国历史上档案损失最为严重的一个时期。由于各种各样的历史原因，许多珍贵的档案荡然无存。下面分别介绍

一下中国现代史档案的整理和保存的情况。

一、旧政权的档案

旧政权档案主要指民国成立以来的档案。其中包括北洋军阀政府时期和国民党政府时期的档案，也包括汪伪政权和伪满政权的档案。这些政府和伪政权都建立了一套比较系统的档案工作机构，如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都设有国史馆，国民党还设有党史编纂委员会，对档案进行整理和研究。但是，旧政权的档案，都存在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些档案常常受到当时政府的严重破坏，甚至有意销毁。

（一）旧政权档案的损毁

1921年北洋军阀政府时期，曾发生了大量拍卖清朝内阁大库档案的严重事件。内阁大库设在皇宫里面，明朝建成以后，专管皇帝在各种活动中形成的档案文件，可以说是御用的档案库房，收藏有各朝皇帝实录、玉牒副本、诏令及各种关系国家大事的档案。当时北洋政府教育部借经费支出困难，将清末内阁大库的档案8000多袋，卖给了北京造纸商人，以作为造纸原料。当时很多人争相抢购，一些学术机关公开定价收购。有些收藏家也乘机收购重要文件，据为己有，或再以高价出售牟利。一时间，弄得乌烟瘴气。鲁迅发表了《谈所谓〈大库内档〉一文》，揭露其丑闻真相。^①

南京国民党政府建立后，对北洋政府的档案，又进行了一次大的破坏。当时国民党政府各部会，分别按系统接受了北洋政府各部的档案。但由于各部的保管不善，这些档案遭到了严重损失。日本攻占南京时，国民党政府各部门把大量北洋政府各部门的档案丢弃在南京。这件事也受到国民党内部一些人的指责。1939年通过的“张继、吴敬恒、邹鲁等十三人提议建立档案总库筹设国史馆文”对此事进行了披露。文中说：“抗战以来，行都设于重庆，当仓皇搬迁时，自国府以及各院部会档案闻亦有散佚弃去者，沦陷区之省府档案更无论矣。

^① 《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21页。

其北平旧阁部档案，恐又不免遗失。以国家如此重宝，付之于不知爱惜者之手，宜其弃之如敝屣也。”日本投降后，这些档案却不见了。这造成严重的后果，以至于新中国成立后几乎找不到北洋政府一个机关的完整档案。这对我们研究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历史，无疑是巨大的损失。

旧政权的档案，除当时政府本身的破坏以外，外国侵略者对我国的历史档案也肆无忌惮地进行掠夺和盗窃，尤其是日本和美国。如在1937年，日本关东军借口制订“开发”我国东北的“五年计划”，要伪满政府将其所属的各机关1932年以来的档案全部集中。到1940年时，已集中了380个机关团体的档案240多万件。这些档案经过整理，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主要资料。抗战胜利前夕，这些档案一部分被日寇运往日本；另一部分被日寇和汉奸焚毁，新中国成立后留下的档案只剩很少一部了。日本投降后，美国也勾结国民党政府掠夺我国档案，国民党经常将一些重要档案出卖或赠送给美国政府。这都造成了民国档案的散失。

国民党政府在其行将崩溃的前夕，把中央党部档案，还有外交、国防等方面的重要档案，全部运往台湾地区，其中也包括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的全部档案。而将国史馆的全部档案和工作人员，都遗弃在祖国大陆。国民党政府各机关，在仓皇逃离大陆前夕，纷纷抛弃档案，销毁档案。国民政府机关带走的档案，在沿途又有不少丢在广州、重庆、成都、昆明等地。

（二）祖国大陆保存旧政权档案的情况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政府以国民党国史馆的史料为主，并接受了国民党中央机关残留在南京的档案，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前身），陆续将全国各地国民党逃亡时遗弃的档案集中南京，开始进行整理编辑工作。1980年以来，中共中央指示将所有中央一级的旧政权档案文件，包括国际、外交、党务等方面的，都归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管。所以该馆成为搜集民国档案较为集中的地点，也是研究中国现代史的

一个资料宝库。

该档案馆是目前集中保管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各个中央政权机关及其直属机构档案的国家级档案馆，截至 2003 年，共收藏有 932 余个全宗，计 180 多万卷，收藏的民国时期图书资料有 5 余万册。其馆藏档案主要有以下 5 部分：

1. 南京临时政府、广州和武汉国民政府档案。1912 年 1 月 1 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建立，史称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的时间不长，形成的文书档案数量馆藏仅 100 多卷，但内容极为珍贵。1917 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1923 年，在广州成立了大本营。1925 年 3 月孙中山逝世后，胡汉民、廖仲恺等人于 7 月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随后进行了北伐战争。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广州国民政府迁往武汉，史称武汉国民政府。从护法军政府直至武汉国民政府，这一时期的南方政权所形成的档案数量庞大，其中有孙中山亲笔批示和签发的文件以及书信和手稿，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反映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的文件等，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2. 民国北京政府档案。1912 年 3 月，南北议和，袁世凯窃取了政权，在北京建立了民国中央政府。自 1912 年 3 月至 1928 年 6 月，北洋军阀统治时间长达 16 年，史称民国北京政府。馆藏其档共有 55 个全宗，13 万卷。这些档案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情况，对研究北洋军阀史有重要意义。

3. 南京国民政府档案。从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 1949 年全国解放，国民党政府统治中国长达 22 年，其间累积形成了数量庞大的档案，其中中央政府的档案，除部分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移往台湾地区外，大部分都留存在祖国大陆。该馆所藏南京国民政府档案共有 600 余个全宗，140 万余卷。这批档案全面地反映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诸方面状况，是该馆馆藏档案的主体，对研究民国史具有重要价值。

4. 日伪（汪伪）政权档案。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